

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出土楚式镜及其研究*

张弛 昌迪

(华南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

史前东西文化交流是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基础。自公元前3千纪初期,青铜冶制、战车制造、麦作农业以及马、牛、羊的驯养技术等就通过“史前丝绸之路”向东传播,而彩陶艺术与粟、黍栽培技术等则沿此路线西去。^①丝绸之路沿线出土各类遗物,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重点对象。关于中国境内早期域外文物,研究著述汗牛充栋,成果斐然。张骞“凿空”之前华夏文化在欧亚草原的传播,学界虽格外关注,但整体研究略显单薄。域外所见中国早期文物以丝绸、漆器、铜镜等最引人注目,但著述寥寥无几。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苏联学界在南西伯利亚地区长期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中国金属镜。但由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上述材料一直秘而不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在南西伯利亚地区陆续获得大量中国金属镜。上述金属镜携带着大量重要的文化信息,涉及史前丝绸之路、匈奴西迁、西辽建国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本文以南西伯利亚地区叶尼塞

(Yenisei)河—鄂毕(Ob)河流域出土的楚式镜为研究对象,对“铜镜之路”及早期华夏文化的对外传播进行探讨。

一 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发现的楚式镜

楚式镜是指战国时期流行于楚国及周边地区,以及楚亡后仍在流行的具有楚式风格的铜镜。^②国内学界认为,楚式镜的文化源头是1982年出土于湖北黄陂鲁台山M31的周文化素面镜。^③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楚式镜已达2000枚以上,主要为素镜、弦纹镜、山字纹镜、四叶纹镜、菱形纹镜、连弧纹镜、兽纹镜、羽状纹镜、几何纹镜等。湖南长沙是楚国的制镜中心,其次是安徽寿县和湖北江陵。有关域外发现的楚式镜材料,目前主要见于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截至2017年,在叶尼塞河与鄂毕河流域13个地点共发现楚式镜及其残片17件,现按区域分布情况简述如下。

* 本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唐时期环塔里木盆地文化地理研究”(41901163)与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汉唐时期塔里木盆地交通路线研究”(2020M682744)资助。

① 张弛:《〈丝绸之路史前史〉中译本评介》,《西域研究》2018年第4期,第127—132页。

② 雷从云:《楚式镜的类型与分期》,《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第20—36页。

③ 长沙市博物馆编著:《楚风汉韵——长沙市博物馆藏镜》,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2—26页。

1.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Krasnoyarsk) 边疆区, 共 2 件

(1) 克拉斯诺图兰斯克 (Krasnoturansk) 市附近出土, 1 件。

(2) 米努辛斯克 (Minusinsk) 区东部出土, 1 件。

2. 阿尔泰 (Altai) 边疆区, 共 3 件

(1) 卡缅斯基 (Kamensky) 地区鄂毕河左岸遗址出土, 1 件。

(2) 舍拉博利辛斯克 (Shelabolikhinsk) 地区鄂毕河流域新肖洛夫卡 (Novoselovka) 村墓地出土, 1 件。

(3) 阿尔泰边疆区鄂毕河右岸菲尔索沃 (Firsovo) XIV 墓地, 共 1 件。

3. 阿尔泰共和国, 共 2 件

(1) 阿尔泰山西麓墓葬出土, 1 件。

(2) 戈尔诺-阿尔泰斯克 (Gorno-Altaysk) 自治州巴泽雷克 (Pazyryk) 6 号墓出土, 1 件。

4. 哈卡斯 (Khakas) 共和国, 共 8 件

(1) 萨彦诺戈尔斯克 (Sayanogorsk) 匈奴墓地出土, 共 2 件。

(2) 贝亚 (Bei) 区贝亚村墓地出土, 1 件。

(3) 乌斯季-阿巴坎 (Usti-Abakan) 地区恰尔科夫 (Qarkov) 西北 7 公里维巴特 (Uibat) 河流域亚罗曼 (Yaloman) II 号墓地 M51、M52、M56、M61 出土, 共 4 件。

(4) 塔什特普斯克 (Tashtypsk) 区阿尔巴特 (Arbat) 墓地出土, 1 件。

5. 托木斯克 (Tomsk) 州, 共 1 件

(1) 叶卡捷林诺夫卡 (Yekaterinovka) 市出土, 1 件。

6. 亚马尔-涅涅茨 (Yamal-Nenets) 自治区, 共 1 件

(1) 普里乌拉尔斯基 (Priuralsky) 地区戈尔诺-克尼亚泽夫斯基 (Gorno-knyazevsky) 村墓地出土, 1 件。

从区域分布可知, 除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里乌拉尔斯基属于鄂毕河下游区域外, 其余均集中于阿尔泰山北麓叶尼塞河上游与鄂毕河上游之间的哈卡斯共和国、阿尔泰边疆区、阿尔泰共和国, 以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内, 占已知出土数量的 90% 以上, 其中米努辛斯克盆地及周边区域分布最为集中, 占出土总数的 50%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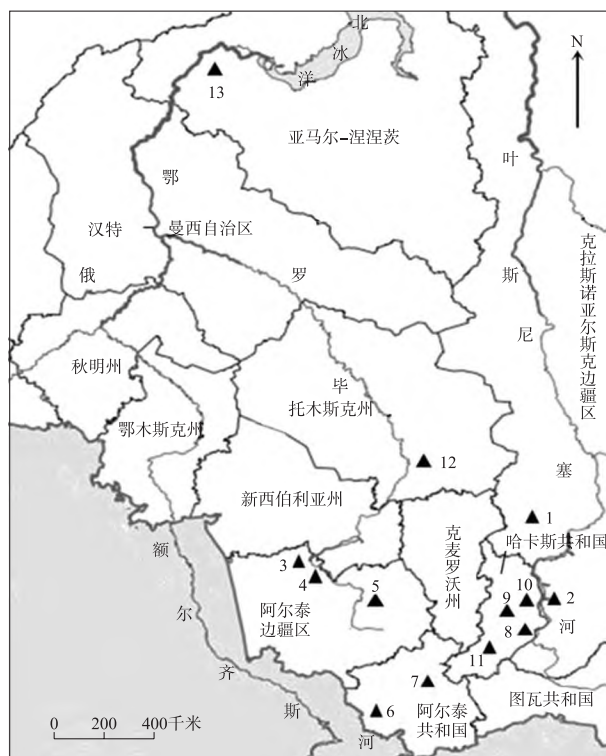


图 1 楚式镜出土位置分布示意图

1. 克拉斯诺图兰斯克市; 2. 米努辛斯克区; 3. 卡缅斯基区鄂毕河左岸遗址; 4. 新肖洛夫卡村墓地; 5. 菲尔索沃 XIV 墓地; 6. 阿尔泰山西麓墓葬; 7. 巴泽雷克墓地; 8. 萨彦诺戈尔斯克匈奴墓地; 9. 贝亚村墓地; 10. 亚罗曼 II 号墓地; 11. 阿尔巴特墓地; 12. 叶卡捷林诺夫卡市; 13. 戈尔诺-克尼亚泽夫斯基村墓地

二 出土楚式镜的类型与年代

在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迄今出土的楚式镜有山字纹镜、连弧纹镜、双凤双兽纹镜、菱形纹环带连弧纹镜、羽地纹四叶镜共5种，特点是胎薄、面平，边窄，主要花纹之下衬以地纹。

(一) 山字纹镜，共发现7件，可分为A、B两型

A型四山字纹镜1件，方座、宽边素卷缘，纹饰以羽状纹为地纹，四山字纹为主纹，出土于哈卡斯共和国贝亚区贝亚村墓地，残片尺寸5.6毫米×6.8毫米，直径约115毫米（图2，1）。^①类似铜镜见于湖南古丈县白鹤湾M38^②、资兴市旧市M165^③以及长沙市南郊树木岭M1^④，但上述铜镜山字纹较为粗短，年代为战国早期至中期。而贝亚村墓地发现的山字纹细长流畅，旋动感较强，其年代应在战国中期偏晚。

B型八叶四山字纹镜，方座、宽边素卷缘，纹饰以羽状纹为地纹，四山字纹为主纹，边缘分布有四组八瓣连叶纹，共发现6件。

(1)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南部克拉斯诺图兰斯克市出土1件，锡青铜，残片尺寸49毫米×22毫米，厚0.8毫米，边缘3.3毫米，重量9克，直径约132毫米（图2，2）。^⑤

(2)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米努辛斯克区东部出土1件，直径115—116毫米，编号：MKM № 5112—5113（图2，5）。^⑥

(3) 2002年哈卡斯共和国萨彦诺戈尔斯克市匈奴墓地出土1件，直径112毫米，厚3毫米，重量102克，编号：SCM № Кр244/20（图2，4）。^⑦

(4) 戈尔诺—阿尔泰斯克自治州巴泽雷克墓地M6出土1件，仅存半边，直径115毫米，厚10毫米，镜面呈银白色，年代为公元前4—前3世纪（图2，3）。^⑧

(5) 阿尔泰山西麓墓葬出土1件，鲁金科在《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中有所论及（图2，6）。^⑨

(6) 阿尔泰边疆区鄂毕河右岸菲尔索沃XIV墓地出土1件残片，现藏阿尔泰国立大学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编号：No.74/369。^⑩

上述四山字纹铜镜在我国境内多有发现，如

① Ю.В.Оборин, Савосин С.Л., *Китайские бронзовые зеркала. Корпус случайных находок*, Красноярск – Москва: Электронное издание, 2017, p.10.

② 湖南省博物馆等:《古丈白鹤湾楚墓》,《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第339—360页。

③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资兴旧市战国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第93—124页。

④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树木岭战国墓阿弥岭西汉墓》,《考古》1984年第9期,第790—797页。

⑤ Т.К.Масумото, *вопросу о китайских зеркалах из Сибири периода Чжаньго*, Идель-Алтай: истоки евраз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Евразийских степей. Барнаул, 2012, pp.49–55.

⑥ Р.В.Белоусов, *Новые находки с урочища Раздумье, Сохранение и изучение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Алтая*, Барнаул: Вып. XI., 2000, p.194.

⑦ М.Н.Пшеницына, С.В.Хавр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еталла клада литейщика Ай-Дай, Саяно-Алта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Древня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2015, p.71.

⑧ S.I.Rudenko, translated by M.W. Thompson,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115.

⑨ С.И. 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潘孟陶译,《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第37—48页。

⑩ [俄] А.А. 提什金、Н.Н. 谢列金:《金属镜: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译,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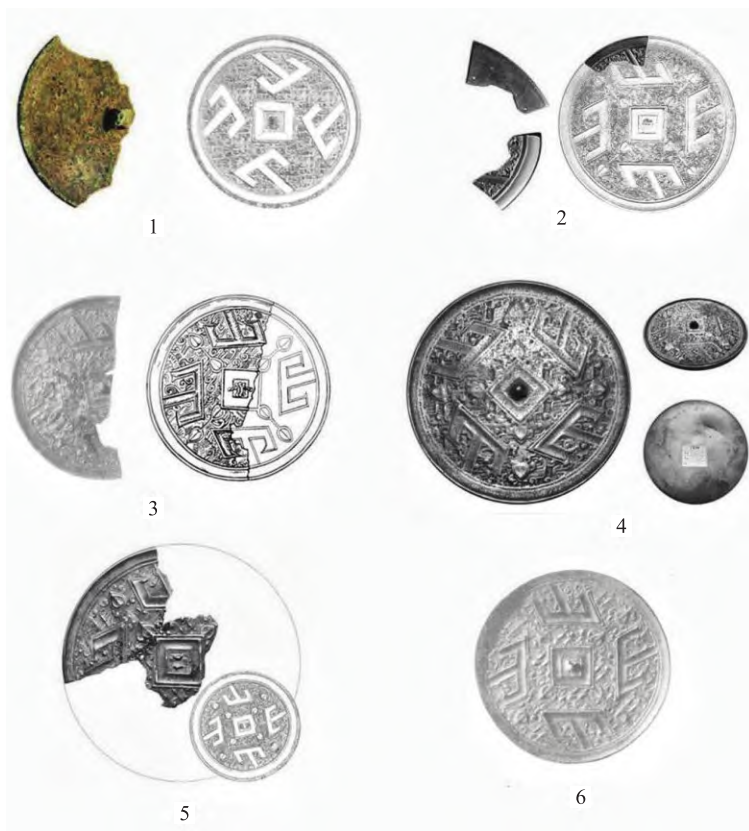


图2 四山字纹铜镜

A型(1.贝亚村墓地); B型(2.克拉斯诺图兰斯克市出土, 3.巴泽雷克墓地M6出土, 4.萨彦诺戈尔斯克匈奴墓地出土, 5.米努辛斯克区东部出土, 6.阿尔泰山西麓墓葬出土)

湖南湘乡市红仑上 M4、洪江市黔城 M12、长沙市九尾冲 M5、长沙市工农桥 M2 等, 年代在战国中期至西汉初期。^① 俄罗斯发现的八叶四山字纹镜中, 巴泽雷克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 383—前 238 年,^② 萨彦诺戈尔斯克匈奴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 2 世纪初, 因此这批铜镜传入的年代应在战国中后期至西汉早期。

(二) 战国连弧纹镜, 共 3 件, 依据连弧数量, 可分为 A、B 两型

A 型七连弧纹镜, 圆形, 圆钮座, 云雷纹地, 外围一周凹面形环带, 其外有凹面宽条带围成的七内向连弧圈, 宽连弧, 素卷边, 共发现 1 件。俄罗斯哈卡斯共和国乌斯季-阿巴坎地区亚罗曼 II 号墓地 M52 出土, 由三块残片拼接而成, 属于塔加尔文化捷先斯基 (Tesensky) 类型, 出土时置于服饰残片上, 墓葬年代为公元前 2—前 1 世纪。铜镜材质为锡青铜, 残片尺寸 63 毫米 × 59 毫米, 厚度 1.5 毫米, 重量 29 克, 直径约为 170 毫米, 现藏阿尔泰国立大学考古学与民族学博物馆, 编号: 181/680 (图 3, 1)。^③ 同类铜镜见于长沙市南门广场 M9^④、陈家大山 M21、梅子山 770 工地 M12 等, 整体年代属战国晚期早、中段。^⑤

B 型八连弧纹镜, 圆形, 圆钮座, 云雷纹地, 外围一周凹面形环带, 其外有凹面宽条带围成的八内向连弧圈, 宽连弧, 素卷边, 共发现 2 件。(1) 2014 年舍拉博利辛斯克地区鄂毕河流域新肖洛夫卡村墓地出土 1 件, 残损严重, 现藏舍拉博利辛斯克地区阿尔泰边疆区博物馆, 编号:

① 邓秋玲:《论山字纹铜镜的年代与分期》,《考古》2003 年第 11 期,第 60—66 页。

② I. Hajdas, G. Bonani, Y. Slusarenko and M. Seifert, *Chronology of Pazyryk 2 and Ulandryk 4 Kurgans Based on High Resolution Radiocarbon Dating and Dendrochronology—A Step Towards More Precise Dating of Scythian Burials*, in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Vol.42, 2013, p.110.

③ Н.Ю.Кунгурова, Ю.В.Оборин, *Клад, обнаруженный на р. Уйбат (Минусинская котловина)*, in *Археология, этнография и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Евразии* (54), 2013, pp.126—136.

④ 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 年,第 67 页。

⑤ 邓秋玲:《长沙出土战国连弧纹铜镜研究》,《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 7 辑,岳麓书社,2010 年,第 227—238 页。

№ 15317。尺寸 100 毫米 × 69 毫米，直径 178 毫米，材质锡青铜，合金成分为铜 64.62%、锡 30.57%、铅 4.55%、镍 0.15%、铁 0.11%（图 3，2）。^①（2）哈卡斯共和国塔什特普斯克区阿尔巴特墓地出土 1 件，锡青铜，残片尺寸 75 毫米 × 70 毫米，厚度 1.3 毫米，重量 30 克，铜镜直径约为 150 毫米（图 3，3）。同类铜镜见于长沙市五里牌窑厂 M3^②、杨家山 M242、桂花园 M32 和四川成都市洪家包木椁墓^③，时代为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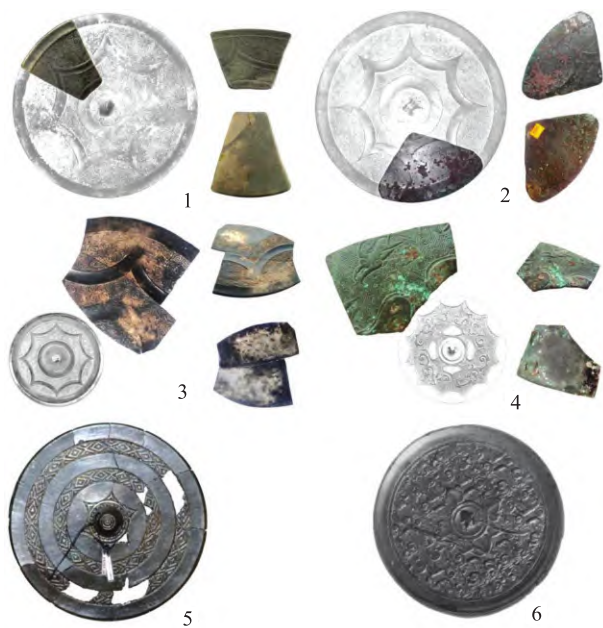


图 3 连弧纹镜、双凤双兽纹镜、菱形纹环带连弧纹镜与羽地纹四叶镜

1. 亚罗曼 II 号墓地出土七连弧纹镜；2. 新肖洛夫卡村墓地出土八连弧纹镜；3. 阿尔巴特墓地出土八连弧纹镜；4. 鄂毕河左岸遗址出土双凤双兽纹镜；5. 戈尔诺—克尼亚泽夫斯基村墓地出土菱形纹环带连弧纹镜；6. 叶卡捷林诺夫卡地区斯基泰墓葬出土羽地纹四叶镜

（三）双凤双兽纹镜，发现 1 件

1999 年由白俄罗斯国家教育大学考古队发现于阿尔泰边疆区卡缅斯基地区鄂毕河左岸遗址，同时出土有卡缅斯基时期的陶器，年代为公元前 4—前 2 世纪。铜镜残片尺寸 55 毫米 × 40 毫米，厚度 1 毫米，铜镜直径约为 160 毫米，材质锡青铜（图 3，4）。^④ 圆镜，环状钮，圆钮座，外围一周凹面形环带，地纹为菱形格内的圆涡纹及碎点纹，钮座外圈伸出四大扁叶，兽凤相间配列。兽身旋转呈弯曲状，后肢伸向镜缘，尾细长上弯。兽腹下伸出花枝，与长尾相对称。凤身与尾呈 S 形卷曲，头部居中，斑眼钩喙，头上有弯卷长冠。凤尾与颈下伸出长花枝，向内勾卷，两相对称。边缘为十二内向平连弧。^⑤ 同类铜镜见于湖南长沙市赤岗冲 M27，年代为战国晚期。^⑥

（四）菱形纹环带连弧纹镜，共 1 件

2015 年发现于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普里乌拉尔斯基地区戈尔诺—克尼亚泽夫斯基村墓地，现藏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博物馆，编号：№ ЯНМ-17713/3（图 3，5）。圆镜，圆钮，圆钮座，六内向连弧纹，菱形纹与环带交替环绕于外围，直径 170 毫米，厚度 2 毫米。墓葬年代为公元前 2—前 1 世纪。铜镜化学检测结果为：铜 61.2%、锡 37.9%、铅 0.15%、砷 0.16%、铁

① А.П.Бороодовский, А.А.Тишкин, *Обломок китайского зеркала из Шагирских юрт в Барабинской лесостепи*, in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11), 2015, pp.87–93.

② 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五里牌战国木椁墓》，《湖南考古辑刊》第 1 辑，岳麓书社，1982 年，第 32—36 页。

③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洪家包西汉木椁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7 年第 3 期，第 14—19 页。

④ Р.В.Белюсов, *Новые находки с урочища Раздумье, Сохранение и изучение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наследия Алтая*, Барнаул: Вып. XI., 2000, pp.191–194.

⑤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 年，第 98 页。

⑥ 高至喜：《论楚镜》，《文物》1991 年第 5 期，第 42—60 页。

0.41%、锌 0.18%。俄罗斯学者认为属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铜镜。^①菱纹镜主要出土于湖南、湖北和安徽，国内尚未发现完全相同的铜镜，仅见一件相似的战国云纹地连弧龙纹镜，出土于长沙市近郊。^②国内学界认为，菱纹镜与山字纹镜同源，但出现年代略晚，其纹饰应源于楚式丝织品，流行于战国中晚期，年代下限可至西汉中期。^③

（五）羽地纹四叶镜，共 1 件

托木斯克州叶卡捷林诺夫卡地区公元前 4 世纪斯基泰墓葬中出土，现藏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图 3，6）。^④三弦钮，圆钮座，纹饰由地纹与主纹组合而成，地纹为羽状纹，花纹顺列反复排成连续图案。在地纹上，由钮座向外伸出四叶，四叶近桃形，素卷边，直径 79 毫米，与湖南资兴市旧市 M117 出土四叶镜纹饰、尺寸相近，年代为战国中期。^⑤

（六）残片 4 件，保留部分楚式镜纹饰和形制特征

（1）2002 年出土于哈卡斯共和国萨彦诺戈尔斯克匈奴墓地，银白色，残片尺寸为 45 毫米 × 35 毫米，厚度 15 毫米，铜镜桥钮部分见三道凹痕，编号：SCM.No.A1026/63（图 4，1）。（2）哈卡斯

共和国亚罗曼 II 号墓地 M61 出土，残片尺寸 46.5 毫米 × 22.5 毫米，重约 10 克，边缘厚度 30 毫米，镜面厚度 1.5—2.0 毫米，镜面纹饰漫漶，编号：No.181/1312（图 4，2）。（3）哈卡斯共和国亚罗曼 II 号墓地 M51 出土，残片尺寸 48 毫米 × 28 毫米，重约 8 克，厚度 2.5—4 毫米，镜面锈蚀严重，编号：No.181/663（图 4，3）。（4）哈卡斯共和国亚罗曼 II 号墓地 M56 出土，残片尺寸 47 毫米 × 35 毫米，重约 18 克，桥钮长度 14 毫米，宽度 10.5 毫米，高度 6 毫米，孔径 5 毫米，镜面厚度 1.5—2.0 毫米，镜面锈蚀严重，编号：No.181/916（图 4，4）。俄罗斯学者根据形制及金相分析认为，上述铜镜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楚式镜。^⑥

三 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出土楚式镜的意义

考古发现表明，南西伯利亚地区在卡拉苏克文化（前 1400—前 900）至塔加尔文化（前 900—前 300）时期，主要流行带柄镜、素面弓钮镜与圆形带孔镜。^⑦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发现的楚式镜则以山字纹镜、连弧纹镜、双凤双兽纹镜、羽地纹四叶镜等类型为主。通过类型学与年代学研究可知，上述铜镜的整体铸造时间是战国中期至西汉初期。结合出土随葬品的年代及文化类型，

① Н.В.Федорова, А.В.Гусев, Ю.А.Подосенова, *Горнокнязевский клад*, Калининград: Научны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Арктики, 2016, p. 63.

② 《湖南出土铜镜图录》，第 69 页。

③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33 页。

④ E.Loubo-Lesnitchenko, *Imported Mirrors in the Minusinsk Basin*, in *Artibus Asiae*, Vol.35, 1973, pp.25-61.

⑤ 高至喜：《论楚镜》，《文物》1991 年第 5 期，第 42—60 页。

⑥ М.Н.Пшеницына, С.В.Хавр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еталла клада литейщика Ай-Дай, Саяно-Алтая и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Древняя металлургия*, 2015, pp.71-72.

⑦ 中国吉林大学考古学院、俄罗斯米努辛斯克博物馆：《米努辛斯克博物馆青铜器集萃》，文物出版社，2021 年，第 45—9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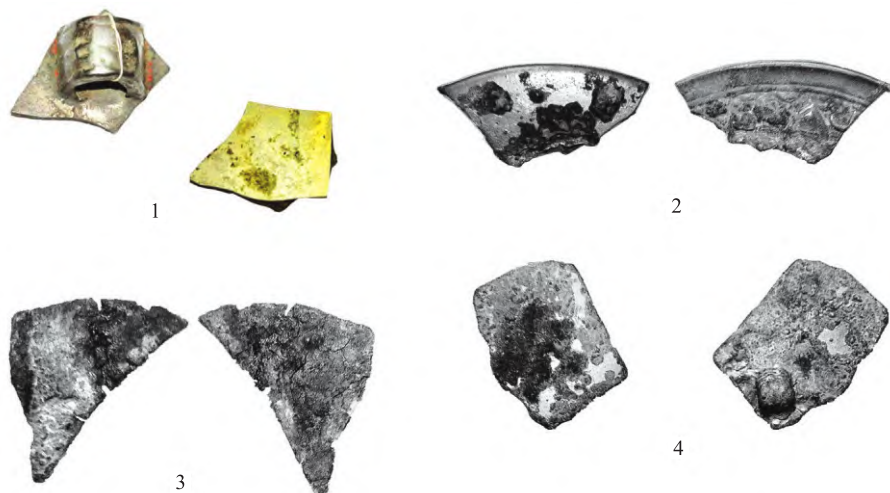


图4 残镜

1. 萨彦诺戈尔斯克匈奴墓地出土；2. 亚罗曼Ⅱ号墓地 M61 出土；3. 亚罗曼Ⅱ号墓地 M51 出土；4. 亚罗曼Ⅱ号墓地 M56 出土

楚式镜最早传入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的时间为公元前4—前3世纪，考虑到随葬铜镜均为实用器，且本身坚固耐用，因此从使用到随葬，可能还存在数年至数十年的间隔，实际传入年代比制造年代略晚。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出土楚式镜的时代特征与地域性，反映出张骞“凿空”之前欧亚草原早期丝绸之路的兴盛。另外，部分楚式镜的传入或与匈奴的崛起和扩张有关。《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单于先“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①后“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②哈卡斯共和国萨彦诺戈尔斯克匈奴墓地、亚罗曼Ⅱ号墓地的大体年代在公元前2—前1世纪，其随葬品带有典型

的匈奴文化特征，与匈奴人群的迁徙与扩张有关。

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与南西伯利亚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早在先秦就已开始，并以此为基点向西延伸。在德国南部斯图加特（Stuttgart）地区霍克杜夫（Hochdorf）墓地，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丝织品残片。^③在黑海北岸克里米亚（Crimean）半岛刻赤（Kerch）地区，出土了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丝绸织物。^④《穆天子传》《山海经》《逸周书》《管子》《尚书》《吕氏春秋》《战国策》等史籍，都曾提到阿尔泰山沿线不同人群与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⑤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的巴泽雷克、秦尼塔（Chineta）Ⅱ号、亚罗曼Ⅱ号、菲尔索沃Ⅳ号、巴沙达尔（Bashadar）Ⅰ号、图艾克塔（Tuektin）Ⅰ号和Ⅱ号等墓地，出土有战国至西汉早期的丝织物、铜镜与漆器残

①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893页。

②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6页。

③ 杜石然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29页。

④ 戴禾、张英莉：《中国丝绢的输出与西方的“野蚕丝”》，《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第7—20页。

⑤ 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前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第1—16页。

片，^①与上述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相互佐证。另外，阿尔泰山北麓斯基泰（Scythian）风格文物如铜牌饰、铜刀、短剑、铜鍔等，也广见于南西伯利亚、蒙古高原及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甘青地区及新疆天山沿线。在湖北荆州鸡公山 M249 战国墓出土的骆驼形灯（图 5），^②也进一步表明在张骞“凿空”之前就已存在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贸易路线。



图 5 湖北荆州鸡公山 M249 战国墓出土骆驼形灯（采自《南有嘉鱼——荆州出土楚汉文物展》）

根据新疆发现的战国时期楚文化遗物推测，早期存在一条由长江、黄河流域通往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的贸易路网，其中一条或沿新疆天山—阿尔泰山脉向北进入南西伯利亚地区米努辛斯克盆地。如 1976—1978 年托克逊县阿拉沟墓地 M28 发现楚文化风格的凤鸟纹丝织品及漆器，M18、M23 出土大量漆皮，年代为战国时期。^③1993—1994 年，巴里坤县黑沟梁战国墓地 IM25 出土山字纹楚镜残片，IM11、IM16、IM17、IM23、IM40 墓室发现残朽漆器。^④2005 年，玛纳斯县黑梁湾战国墓地 2005MDHM2 出土一件完整的四山字纹楚式镜（图 6）。^⑤2014 年，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 M15 出土漆皮和楚式羽状地纹镜残片，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早期。^⑥

由于楚式镜铸造精美、风格独特，因此也出现当地族群仿造的现象。在哈萨克斯坦曾出土一面带柄六山字纹铜镜，直径 15.3 厘米，表面纹饰漫漶，年代为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 2 世纪。^⑦中亚地区主要流行斯基泰风格的带柄镜、素面镜和卷沿镜，此类六山字纹镜应与楚式镜有关。扎德涅普罗夫斯基^⑧（Zadneprovskiy）、白云翔^⑨等学者曾撰文指出：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3 世纪的中亚地区存在大量汉式镜及仿汉式镜。因

- ① [俄]阿列克谢·提什金：《阿尔泰山早期游牧民族墓葬出土的中国古代漆器》，张良仁译，《北方民族考古》第 5 辑，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188—197 页。
- ② 深圳南山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编：《南有嘉鱼——荆州出土楚汉文物展》，文物出版社，2020 年，第 121 页。
- ③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第 18—22 页。
- ④ 潜伟：《新疆哈密地区史前时期铜器及其与邻近地区文化的关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第 112 页。
- ⑤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局编：《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文物出版社，2014 年，第 215 页。
- ⑥ 于建军、胡望林：《2014 年新疆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考古发掘新收获》，《西域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131—132 页。
- ⑦ S.Stark, K.S.Rubinson, Z.S.Samashev and J.Y.Chi,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78.
- ⑧ [俄]Ю.А.扎德涅普罗夫斯基、E.H.鲁沃-莱斯尼琴科：《中亚费尔干纳出土的汉式镜》，白云翔译，《考古与文物》1998 年第 3 期，第 84—93 页。
- ⑨ 白云翔：《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文物》2010 年第 1 期，第 78—86 页。



图6 新疆玛纳斯县黑梁湾 2005MDHM2 出土四山字纹铜镜（采自《丝绸之路天山廊道：新疆昌吉古代遗址与馆藏文物精品》）

此，上述六山字纹铜镜应该是当地人群仿制楚式镜的产物。

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发现的楚式镜对研究中国铜镜在域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境内已发现楚式镜的地理分布，包括湖南、湖北、安徽、四川、重庆、河南、山东、河北、山西^①、陕西^②、内蒙古^③、甘肃^④、新疆等地，可大致还原出以长江流域湖南、湖北为中心，向域外传播的路径：（1）由我国中原地区经太行山、阴山一带至内蒙古草原，再由蒙古高原抵达南西伯利亚地区；（2）经秦

岭、祁连山沿线，通过河西走廊抵达天山—阿尔泰山一带，再进入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

俄罗斯学者鲁金科（Rudenko）、提什金（Tishkin）、谢列金（Seregin）等认为，至少在公元前 1 千纪中叶，阿尔泰山沿线与黄河、长江流域地区已有密切的物质文化交流与互动，而这种与西方的交往可能与西戎、月氏、匈奴、羌等人群的“中介”作用有关。^⑤国内学界认为，在张骞“凿空”之前，连接中原腹地与欧亚草原的贸易之路已经存在，且贸易应以西戎、匈奴、羌、月氏等人群为“中介”。^⑥张星烺指出：“鄙意秦皇以前，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义。汉初执政者，皆丰、沛子弟，悉非秦人。秦国之掌故，鲜能道者，以致秦国与西域之交通事迹，史无详文也。”^⑦

另外，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楚式镜的出土情境也值得关注。如以巴泽雷克墓地为代表的斯基泰文化，多将楚式镜完整平置于墓室中，保存良好；而匈奴文化墓葬中的楚式镜残损严重，多见明显的破坏痕迹，或与毁镜习俗有关。类似的丧葬习俗亦见于我国早期关中秦墓^⑧及北方匈奴、鲜卑^⑨人群的墓葬中，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探究。

综上所述，楚式镜是战国至西汉早期华夏文化的瑰宝，在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楚式镜质

① 山西博物院编：《山西博物院藏品概览·铜镜卷》，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1—13页。

②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第31—35页。

③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盛乐遗珍：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遗址出土文物精品》，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116—118页。

④ 杨万华：《甘肃武都县东古城出土战国铜镜》，《考古》1996年第3期，第80页。

⑤ 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44页。

⑥ 史党社：《从考古新发现谈前丝路的一些问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5页。

⑦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2003年，第6—7页。

⑧ 马利清：《出土秦镜与秦人毁镜习俗蠡测》，《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146—152页。

⑨ 马利清：《匈奴墓葬出土铜镜及毁镜习俗源流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76—82页。

地轻薄，造型精巧，工艺精湛，构图上以镜钮为中心，形成主、地纹相衬托的格局，体现了楚文化神奇瑰丽的浪漫主义特征。楚式镜源于宗周文化体系，代表了中国早期铜镜艺术的高峰，在工艺、形制、纹饰上都反映出华夏文明的精神气度，以至于早期汉镜完全模仿并继承了楚镜的风格。

楚式镜在南西伯利亚地区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的发现，一方面证明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已存在一条沟通欧亚草原东西部物质、文化交流的通道；另一方面也表明以楚式镜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在欧亚草原的广泛传播，这也正是本文关注与研究南西伯利亚地区出土楚式镜的意义所在。

英文摘要

Study on Bronze Mirrors of Chu Style Unearthed in the Yenisei and Ob , Russia

Zhang Chi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ang Di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bronze mirrors of Chu style were popular in Chu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At present, at least 18 Chu's mirrors have been unearthed in the Yenisei and Ob river basins in Russia. The tombs and sites excavated Chu's mirrors date from the 4th century BC to the 1st century BC. It indicates that before Zhangqian's passage to the Western Region, there existed a "Bronze Mirror Road" connecting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with the southern Siberia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Influence of Sautrantike Thought on Qiuci Buddhism: On the Theme of *Abhidharmakosa* and Kizil Grottoes

Huo Xuchu (Xinjiang Kizil Grottoes Research Institute)

Abstract: It is recorded in *The Biography of Master Sanzang* that the classics worshiped by Qiuci Buddhism include *Samyuktabhidharma-hrdaya-sastra*, *Abhidharmakosa-sastra* and *Abhidharma-mahavibhasa-sastra*. These three sutras are important landmark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l ministry thought. This record also shows the mainstream thought and basic development of Qiuci Buddhism. Although all the mainstream thoughts of the ministry run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Qiuci Buddhism is influenced by the thoughts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e Ministry Buddhism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Years of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Sautrantike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Qiuci Buddhism. Since the heritage of Qiuci Buddhism is mainly grottoes and other artistic forms, it is the only way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Qiuci Buddhism with "The Buddhist method of representation". This thesis, based on the representative classic *Abhidharmakosa-sastra*, trie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classics on Qiuci Buddhism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and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images in Kizil Grottoes.

The Idea of Sautrāntika was Popular in Ancient Kucha

Li Ruizhe (Art Schoo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Sautrāntika was one of the latest schools of Buddhism, which attaches importance to